

香港近一百五十年印坛辑要

刘浩敏

香港在岭南印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早于 1930、1940 年代，因战乱而移居香港的金石家篆刻家逐渐递增，或流寓、长居香港，或游走于粤港之间，他们藉由教学、雅聚、出版、展览及结社等活动，奠下了香港印坛的发展基石，所涉印人、学者，或具影响力的人物与活动，不胜枚举。

尽管如此，香港并无篆刻史的专著，探究斯学者寥寥无几，近百年来仅有文章数篇。香港当代印人邓昌成于 1988 年首撰〈香港篆刻发展概况〉及篇幅相近而发表于不同刊物的文章，如〈香港篆刻发展史〉（1989）、〈香港的篆刻的发展与回顾〉（1995）等，对 1940 至 1980 年代的香港篆刻发展作一概述，并摘录其所知见的一手资料，为香港印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。¹ 继有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唐锦腾发表〈香港早期印坛概述〉（2005）一文，揭示了 1940 年代或之前所涉的印学事迹，对于增补印学史料，并理解尚处于发展雏型之香港印坛，均具帮助。²

有关香港印人的资料，载籍零散，且多从粤域文化的视角切入，范围广泛；相关考述早见于邓尔雅〈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〉（1947），后有余祖明编《近代广东印人遗作汇辑》（1974）、马国权（1931-2002）集广东及近世印人编成《广东印人传》（1974）、《近代印人传》（1988）等，涵盖了不少香港的印人事迹。³ 另外，本地个别印人集自刻印成谱、数家合辑者，或展览场刊等，较常见于 1990 年代或以前，不单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录，也可藉此窥见香港印坛一隅。

¹ 参邓昌成：〈香港篆刻发展概况〉，载《印林》（1988 年 10 月第 53 期），页 50-54；邓昌成：〈香港篆刻发展史〉（上、下），分载《书谱》（1989 年总第 86 期），页 76-77 及《书谱》（1989 年总第 87 期），页 63-68；邓昌成：〈香港篆刻发展史〉，载香港友声印社编：《香港篆刻报》（1989 年 3 月第 1 期），页 1 及 8；邓昌成：〈香港的篆刻的发展与回顾〉，载林汉坚编：《香港视艺年刊（1993-94）第一期：正反》（香港：香港视觉艺术研究会，1995），页 83-85；邓昌成：〈香港篆刻发展史〉，载林亚杰、朱万章编《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》（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，页 130-135；邓昌成：〈香港篆刻发展史〉，载《香港篆刻名家作品集》（香港：油尖区文化艺术协会，2005），书后（无页码）。

² 参唐锦腾：〈香港早期印坛概述〉，载莫家良编：《香港视觉艺术年鉴 2005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，2006），页 145-182。

³ 邓尔雅：〈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〉，载《南金》（香港：南金学会，1947 年创刊号），页 13-16；余祖明：《近代广东印人遗作汇辑》，台湾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74；马国权：《广东印人传》，香港：南通图书公司，1974；马国权：《近代印人传》，上海：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98。

近年来，内地学者对广东印学发展的梳理渐次重视，成果显著。2010 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应商志〔香覃〕（1993–2009）之嘱，重新校订冼玉清（1895–1965）《广东印谱考》，⁴ 为迄今汇辑广东印谱数量最多的一部，所涉考证不乏香港印迹。2016 年由「岭南印社」、「岭南书画院」首办「岭南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」，且集论文 48 篇辑成《印说岭南：岭南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虽并非以香港印学为侧重点，但旁涉香港印人印迹者逾十篇。⁵ 另有郭守运《岭南篆刻艺术史论》（2017）、梁晓庄《岭南篆刻史》（2017）等专书，皆在探讨岭南篆刻的同时，对港、澳地区有所涉猎。⁶

概言之，香港在岭南篆刻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可惜资料零散不整或匮乏待考，专题研究几乎处于空白，若要重构岭南印史，香港印学的地域研究实在不容忽视。

香港为岭南印学发展的重镇

香港印史肇始于 1872 年 晚清篆刻家徐三庚（1826–1890）应友人王韬（1828–1897）之邀自沪来港，曾刻「弢园藏」（1872）一印并有款记：「紫诠老友审之。壬申中秋，将之五羊城，道经香港制此。徐三庚记。」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香港印迹。⁷ 1909 年，著名印人齐白石（1864–1957）因钦州之行路经香港，逗留八天。据齐白石《寄园日记》载，钦州之行是应郭人漳（？–1922）之邀，前后约半年之久，期间作画二百五十余幅，刻印二百八十余石。过港时，友人李铁桓（生卒不详）为其古琴乞求齐白石篆刻「天语」二字。⁸ 终究其所刻「二百八十余石」中有多少在港所制，则没有记载，又因作品散佚，无从而知，然却为香港早年印坛留下重要的印记。

源起于晚清的香港印史，一直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，原因是中国印学研究起步较晚，缺乏文字记载，保存意识淡薄，研究方法尚未成熟，而且书印同源，相辅相

⁴ 冼玉清：《广东印谱考》（校订本）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0。

⁵ 徐畅、曲斌编：《印说岭南：岭南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6。

⁶ 参郭守运：《岭南篆刻艺术史论》（广州：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，2017），页 156–158；梁晓庄：《岭南篆刻史》（广东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7），页 467–469。

⁷ 参郭锋利：〈徐三庚游粤考〉，载《印说岭南：岭南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（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6），页 175–179；并参唐锦腾：〈香港早期印坛概述〉，页 145。

⁸ 参齐白石：《寄园日记》（石家庄：河北美术出版社，1985），页 70–72；并参萧芬琪：〈齐白石香港七日游〉，载黎健强主编：《形彩风流—香港视觉文化史话》（香港：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2），页 90–92。

成，故常被相提并论，印相对易被忽略，研究者不多，于香港尤甚，仍有大片空白有待填补。然而，在香港印学历史进程中，必要提到的两个重要阶段，分别为：（一）发展关键期（约 1940、1950 年代）：香港成为岭南印学文化传承的据点，印人、金石学者、收藏家避地香港，并携同珍贵文物逃难于此地，免遭兵灾，印人印迹渐多，这时代背景促成了香港印坛往后三十年长足的发展；（二）高峰阶段（约 1970、1980 年代）：前人的实践发挥一定影响力，本地的印人和活动日趋频繁，并积极推广印学，连系国内外，包括中国内地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等，在推动并延续岭南篆刻占有重要地位。

（一）、发展关键期（约 1940、1950 年代）

1940、1950 年代，粤地人才和文物流转至此，使香港成为文献保存、甚至岭南印学发展的要地。1940 年，叶恭绰（1881-1968）发起组织「中国文化协进会」联合在港文化界人士，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「广东文物展览会」。此展的参观群众达廿万人次，并出版了《广东文物》一书，不仅详细记载了整批文物流转及保存的情况，也收录了大量珍贵文物数据、图片及相关文章。⁹ 与金石篆刻相关者，包括：广东历代官私古玺，以及明清流派印章、印谱及印学论著等，所涉粤籍印人包括：谢景卿（1735-1806）、黎简（1747-1799）、陈澧（1810-1882）、柯有榛（1814-1885）、朱光夜（生卒不详）、潘仪增（生卒不详）、李文田（1834-1895）、梁于渭（1842?-1913）等。当时任「香港书画文学社」主持兼本地多间美术报的编辑罗元桐（1889-1942）曾撰〈观文物展览会书感〉一文，记录了本地印人简经纶（1888-1950）在会场刻印的情况。¹⁰

1949 年，香港始见最早的印社，何筱宽（1916-?）在中环同文街办「艺一印社」，起初替人刻私人图章、商号用印等，后来经营书印家的中介代理，兼办展览、销售材料工具等业务。¹¹ 唐积圣（1927?-2010）尝于「艺一印社」工作，主要负责刻印，善刻各种木、石、牙及玉等材料，据其忆述，本地名宿邓尔雅（1884-1954）常留连于该社，甚至会即席篆刻挂单稿件，其学生张祥凝（1909-1960）、刘玉林（1901-1950）往往跟随，朝夕旁听。另，冯康侯（1901-1954）、罗叔重（1898-1968）等也经常到访，互相谈印论艺。¹²

⁹ 参广东文物展览会编：《广东文物》（全三册）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3；并参黎树添：〈冯平山先生与图书馆〉，载《香港图书馆协会学报》（1984 年第 8 期），页 51-56。

¹⁰ 罗元桐：〈观文物展览会书感〉，《广东文物》（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0），页 260；并参梁晓庄：《岭南篆刻史》（广东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7），页 467-469。

¹¹ 参邓昌成：〈香港篆刻发展史〉，《香港篆刻报》（1989 年 3 月第 1 期），页 1 及 8。

¹² 参邓伟雄：〈略述唐积圣先生的雕刻艺术〉，载唐锦腾编：《香港视觉艺术年鉴 2011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，2012），页 130-133。

这阶段或之前，本地不乏书画团体举办雅集、交流及展览等各种活动，当中或有印人切磋印艺，可是「印社」或「以印会友」为宗旨的组织，则尚未可考。继「艺一印社」后，有冯康侯组「南天印社」（1962）、赵鹤琴（1894–1971）创「书画刻三艺学社」（1969）也为重要，但为时较短暂，相对「艺一」虽较少人知晓，却于其时甚具凝聚力，在香港印坛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
继后，何筱宽、冯康侯、罗叔重等人更于 1958 年夏首次发起「省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联合展览」，在万宜大厦 2 楼举行，参与者有 30 余人，并出版了《现代篆刻合辑》（1958），录入廿位印人、近 220 枚印铃，包括：区建公（1886–1972）、赵鹤琴、何秀峰（1898–1970）、李祖佑（1897–1965）、罗叔重、陈丽峰（生卒不详）、冯康侯、刘骅宇（1904–1985）、陈语山（1904–1987）、陈宗虞（生卒不详）、黄思潜（1907–1985）、林景穆（1909–？）、易越石（1912–2007）、何筱宽、关则哲（生卒不详）、何少强（1917–？）、陈秉昌（1921–1999）、林世昌（生卒不详）、林近（1923–2004）、骆晓山（1924–？）。¹³ 这次「粤、港、澳」三地联展，以活跃于香港的印人居多，足以反映香港是岭南篆刻交流及发展的要地。

更值一提的是，其中参展者易越石为本地著名金石家，曾为一同参展的李祖佑刻印一方，以订二人交谊，印款内容更记载了展前准备的一次聚会，涉各年辈篆刻家共廿余人；印款刻道：「祖佑先生对金石书画造诣深湛，且精篆刻，业西医者能有如此成就者，海内外仅君一人而矣。戊戌四月，为余港第九年，欣逢李府盛会，集同道廿余人于一堂，商讨第一次联合展览事，诚为群贤毕至、少长咸集，因索石为刻。此印籍订金石之交，并希教正，以收良师益友之效，越石志赠。」（「李祖佑印」，1958）揭示了当时印人活动的真实记录，可为香港印史补上一笔。

这方李祖佑的姓名印，与其生前自用印合 50 多枚，现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，为馆中重要收藏，刻印者除易越石外，还有：林千石（1918–1990）、冯康侯、何少强、高甜心（1915–？）、简经纶、张炽良（生卒不详）、何筱宽、陶寿伯（1902–1997）、张祥凝、许半愚（1914–1968）、罗叔重、方去疾（1922–2001）等，多为香港或粤籍印人。李祖佑虽不以艺名称着，但嗜好中国书画、篆刻，与香江艺坛中人来往密切，且收藏金石、书籍类甚丰；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曾于 1967 年购入其藏书共 3,218 册，其中包括 219 种印谱，对保存文献，以至推动印学发展，贡献良多。¹⁴ 惜其在当今印坛几乎名不经传，若对其遗藏详加考证，定对香港、及

¹³ 《现代篆刻合辑》，香港：南洋印刷公司，1958。

¹⁴ 参黎树添：〈冯平山图书馆简史〉，载陈炳良主编：《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论文集》：

至岭南印史的补遗大有裨益。

（二）、高峰阶段（约 1970、1980 年代）

香港印坛于 1940、1950 年代奠下发展基石，延续至 1970 年代，在前人成果的累积下，新一代印人日趋活跃，积极于交流与推广印艺，而「香港友声印社」的成立，更把香港篆刻推上一个发展高峰。

香港友声印社编《香港篆刻报》（1989）详细记录了「友声」的成立及其活动；1978 年初，邓昌成、禰绍灿、许文正、陈树宜、许晴野、李怀谦、陈岳钦、黄植江等，欲效法「西泠印社」（1904）诸子立契组社，正式成立「友声」。「友声」取自春秋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：「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」有寻求同伴应声的意思。在创社初期有社员 11 人，后增至 40 余人，合中、青各辈，主要社员还有陈秉昌、林章松、何继贤、孔平孙（1924–2016）、梁秋白、陈礼源、茅大容、彭植良、区大为等，至今部分印人仍活跃于本地印坛，薪火相传。历年印行篆刻刊物，包括：《友声印集》12 集（1978–1987）、《香港胜迹印选》（1982）、《香港四家印谱》（1985）、《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印拓》（1988）、《印谱快讯》（1988）、《友声通讯》（1988）、《香港篆刻报》（1989）及社员个别印谱等，透过定期发表作品、文章，介绍会社活动，切磋印艺，交流成果，深受同行称道，亦为香港印人和活动的历史记载。¹⁵

建社十年间，印社活动极之频繁，「以印会友」的宗旨清晰，透过持续出版、教学、举办展览、交流活动等，把香港印人印艺推广至国内外。印社曾多次在港款待著名篆刻家，包括：台湾曾绍杰（1910–1988）、梁乃予（1927–2001）、薛平南、黄尝铭、郑多铿，新加坡施香沱、陈岳钦，日本中岛春绿，韩国郑文卿，中国内地钱君匋（1907–1998）、韩天衡、朱关田、余正、陈振濂等，建立起一个独特的交流平台。另外，跨地区活动多不胜数，重要者计：1983 年前往杭州祝贺「西泠印社」建社 80 周年，并参加了开幕庆典及各项活动，又于 1984 年，与韩国、台湾、新加坡、美国、英国等地篆刻家，联合在汉城（今首尔）举办「第一届国际篆刻大展」等。¹⁶

毫不讳言，「友声」可谓香港历来最具规模、涉及印人数量最多的金石篆刻社，其活动范围之广，在 1970、1980 年代成为推广并延续岭南篆刻的重要枢纽。与

1932–1982》（香港：冯平山图书馆，1982），页 16–30。

¹⁵ 参香港友声印社编：《香港篆刻报》（1989 年 3 月第 1 期），页 1–8。

¹⁶ 同上注。

此同时，香港印坛发展的高峰，兼体现于印章考藏、印学论著等方面；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，金石研究专家马国权、王人聪移居并活跃于香港，其著录所涉种类甚多，包括：印史述略、古玺考证、明清篆刻之学派、广东印学，及近世印人传略等，斐然可观，至今仍是海内外印学研究之重要参考。

马国权曾任香港《大公报》撰述员，兼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，并在中大艺术系任教书法篆刻，多次应邀至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及中国内地讲学、举办展览。平生著作等身，以书印著述尤多，在港出版的印学著作计有：《篆刻艺术选集》（1970）、《广东印人传》（1974）、《广东县市名印谱》（1992）、《名家谈篆刻》（2001）等。¹⁷ 王人聪则历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、研究员及荣誉研究员，在职期间兼教于中大艺术系，其著述以中大文物馆印行为主，包括：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集》（1980）、《印章概述》（1982）、《新出歷代玺印集释》（1987）、《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》（1990）、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续集》（一、二、三）（1996、1999、2001）、《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（2000）、《古玺印与古文字论集》（2000）等。¹⁸

这些著述虽非以梳理香港印史为重点，但对香港印人和本地藏古玺有所涉猎，标志着本地印学的研究成果，至今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印学专论，重要者如：蔡守《印林闲话》（连载于《香港华字日报》）（1919前后）、邓尔雅《篆刻卮言》（年份待考）、易越石《历代印学家概述》（1999）、孔平孙《孔平孙印论集》（本名《印文指讹》）（2002），¹⁹ 1970、1980年代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，成就了香港印学史的高峰。

黄牧甫与香港印坛

香港印学，传承自广东篆刻流风，即以黄牧甫（1849–1908）为主流风格的「岭

¹⁷ 马国权：《篆刻艺术选集》，香港：万叶出版社，1970；马国权编：《广东印人传》，香港：南通图书公司，1974；马国权、马达为：《广东县市名印谱》，香港：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，1992；马国权：《名家谈篆刻》，香港：商务印书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1。

¹⁸ 王人聪：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1980；王人聪、罗福颐：《印章概述》，香港：中华书局，1982；王人聪：《新出歷代玺印集释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1987；王人聪、叶其峰：《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90；王人聪：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续集》（一、二、三）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1996、1999、2001；王人聪、游学华：《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2000；王人聪：《古玺印与古文字论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2000。

¹⁹ 蔡守：《印林闲话》，连载于《香港华字日报》，1919前后；易越石：《历代印学家概述》，香港：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1999；孔平孙：《孔平孙印论集》，澳门：焦点艺术空间，2002。

南派」，因其祖籍安徽黟县，故又称「黟山派」，清末民初广东一带以其印风最为盛行，影响力遍及香港。究其主因，岭南名家篆刻之中流传最广者为黄牧甫，有多种印谱传世，现所知见超过60种，存世印铃逾2,400多枚，因而印貌得以广传，从学者众。²⁰ 事实上，只有少数印人能亲受黄牧甫的教益，除其子黄少牧（1879–1953）外，仅有李尹桑（1882–1945）、易大厂（1874–1941）、邓尔雅、刘庆嵩（1863–1920）可视为嫡系传人，却足以以为香港印坛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，使「岭南派」在香港扎下深厚根基；且由四人说起，一窥岭南篆刻延至香港的发展脉络。

1918年，李尹桑与易大厂、邓尔雅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「濠上印学社」，大力推动岭南印学的发展；近世著名篆刻家陈巨来（1904–1984）《安持精舍印话》（1982）道：「近代印人，南有李玺斋尹桑、邓尔雅万岁、易大厂熹之三君者，渊源所出，岌出牧甫，各有所擅，未可轩轻。」²¹ 可见三人承袭「岭南派」在近代印坛上享有盛誉。

李尹桑为黄牧甫嫡传弟子，在黄氏任职广雅书局校书堂之时，曾师事其门下约四五年之久。黄氏曾为李尹桑刻印甚多，存世印铃约50枚，其中一印有款刻道：「此牧甫数十石中不得一之作也，平易正直，绝无非常可喜之习，愿茗柯珍护之。」（「师实长年」，1899年或前）受牧甫亲炙，李氏继承了其师完整光洁的特点，深研古玺，悟得平正中求变化的妙处，存世有多种印谱。²² 师从李尹桑的计有区梦良（1888–？）、冯衍镠（1911–1954）及尹桑之子李步昌（1902–1970）；其中冯衍镠曾执教于香港，尝与李天马（1908–1990）同辑《李玺斋先生印存》（年份待考），又曾集拓黄牧甫刻印50余成《双清阁铁书经眼录》（年份待考），使黄牧甫及其传人印貌得以保存。

黄牧甫更于临终前把生前手铃自刻印稿《黄穆甫印存续补》（1908）²³ 交托李尹桑，无疑是倾囊相授，视之为传人。李氏对此谱极为珍爱，但晚年穷困、生活所迫，将此谱归本地文人学者高贞白（1906–1992），高氏拟付梓广传，并请邓尔雅撰序，惟因故印谱没有印行，邓序之原稿亦因印刷公司失火而未能保存。幸而，邓序曾发表于香港《南金》杂志创刊号（1947），故序文内容得以传世，邓

²⁰ 刘浩敏：〈所知见黄牧甫印谱传本〉，载《岭南印记—刘浩敏印学文集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，2018），页122–149。

²¹ 陈巨来：〈安持精舍印话〉，载《印学论丛—西泠印社80周年论文集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，1987），页15。

²² 李尹桑印谱见《大同石佛龕印稿》、《李玺斋先生印存》、《戊寅印稿》、《李茗柯玺印留真》、《李尹桑印存》等。

²³ 黄牧甫编：《黄穆甫印存续补》十三册，其他不详，约1908年。

序中记载李尹桑对其师用刀技法的领悟：「先生冲刀全依古法，执刀极竖，不异笔正，白文尤显而易见，每作一划，自起讫收，平直无些子窒碍，如久积印泥，先涤至净，试以刀轻划之果然。」²⁴ 相信邓、李二人均受黄牧甫影响至深。后此谱由高贞白传至香港印谱收藏家林章松，现为其松荫轩所藏。此谱为海内外孤本，所录黄印近 700 枚，多为未见于他谱者，是极珍贵的研究资料。²⁵

易大厂早年藉由在广雅书院读书之便常请益于黄牧甫，其印自黄氏蜕化而出，不着意于形貌之模仿，取封泥、急就凿印等意趣入印，又善于章法布局，构图奇崛，在民国印坛中占重要地位，并有多种印谱见世。²⁶ 除与李尹桑、邓尔雅等常常互相参研印艺，成立「濠上印学社」（1918）外，后迁居北京，又与罗振玉（1866–1940）、陈半丁（1876–1970）、寿石工（1886–1949）等40余人组成「冰社」（1921），对岭南印风的传播有开拓之功，师承者有简经纶、潘静安（1916–2000）、何秀峰等，均为香港早年印坛的中坚人物。

邓尔雅幼岁即好篆刻，因其父邓蓉镜（1834–1903）曾掌教广雅书院，与黄牧甫份属世交，虽未得黄氏亲炙，乃能私淑之。²⁷ 其篆刻独宗黄牧甫，广涉博览，凡古玺、汉印、魏碑、元押、造像等皆以入印，刀法挺拔光洁，尤善布局，尝曰黄印「尤长于布白，方圆并用，牝牡相衔，参伍错综，变化不可方物。」²⁸ 曾着多种金石篆刻字书。²⁹ 晚年定居香港，以课徒鬻艺为生，受业于邓氏有余仲嘉（1908–1942）、张祥凝、刘玉林，另其子侄、继室皆擅刻印，又与本地印坛中人过从甚密，重要展览要数由香港「园社」举办「邓尔雅、冯康侯、冯师韩、卢鼎公、林千石岭南五名家篆刻书法展」（1947），使岭南篆刻在香港产生广泛的影响。

承「岭南派」一脉，刘庆嵩相对较少人提及；其乃黄牧甫友人，人品、学识皆受黄牧甫赞赏，黄氏曾刻「刘聘孙」（1890）一印记：「岁己卯客江西，始知

²⁴ 邓尔雅：〈黄穆甫印存续补序〉，载《南金》（香港：南金学会，1947年创刊号），书后（无页码）。

²⁵ 刘浩敏：〈黄牧甫流派印人〉，载《黄牧甫生平及篆刻艺术之研究》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史哲学博士论文，2012），页121–129。

²⁶ 易大厂印谱见《秦斋魏斋玺印合稿》、《魏斋玺印集》、《大厂印谱》、《大厂居士造像印集》、《孺斋自刻印存》、《古溪书屋印集》等。

²⁷ 谢光辉：〈黄牧甫岭南印事考述〉，载林明、谢光辉编：《黄土陵印存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0），页23–24。

²⁸ 邓尔雅：〈黄穆甫印存续补序〉，载《南金》（香港：南金学会，1947年创刊号），书后（无页码）。

²⁹ 邓尔雅著述有《印雅》、《篆刻卮言》、《印媵》、〈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〉、《文字源流》等。

有刘聘孙者，其后五年来粤东，始与相见，又六年再来再相见重，以故知日渐密，领其言论，读其述作，然后知其蓄积富好慕正，陵当就而考德稽疑，遂订交焉。鲁语云：『积土累篲可成邱山。』聘孙原据邱山之势者，知进而不止于乎，其可量哉。聘孙与陵非宴旻一朝之好也，因其行于是乎言。庚寅夏六月，黟黄土陵。」可见黄、刘二人交谊甚深，虽黄牧甫比刘庆嵩年长14年，彼此亦师亦友的关系达廿年之久。刘氏篆刻初宗「浙派」，以切刀治印，后受黄氏影响，改用冲刀法，印风光洁明快、刚劲雄浑。继有陈融（1876—1955）、冯康侯及其侄刘玉林等师从学印，成为「岭南派」的重要传人。

师承刘氏，陈融印风秀逸峭拔，独具面目，且富收藏，曾以其所藏黄牧甫、刘庆嵩及冯康侯篆刻辑成印谱，包括：《颛园藏石》（1935）、《陈协之先生所藏黄穆父刻印》（1948）、《黄梅花屋印集》（年份待考）等，对黄牧甫印风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。冯康侯则对香港印坛具深远影响；他早在13岁从刘庆嵩学篆刻，在刘氏的指导下反复临习黄牧甫作品，又从其表叔欧阳务耘（1864—？）所藏黄氏印稿、墨迹、印章、款刻获深刻体悟，一如黄牧甫亲授。冯氏印风多样，刀笔精到，清新俊逸，承继了黄牧甫一派遗风。1949年前后，冯康侯移居香港，先创「南天印社」、后设「广雅书学社」（1967），传授书、画、篆刻，更尝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、香港大学校外课程等，首开风气，在当时造就了不少治印人材，与邓尔雅、罗叔重、陈语山、卢鼎公（1903—1979）誉为「香江五老」，促使岭南篆刻风气在香港蔚然成风。³⁰

自李尹桑、易大厂、邓尔雅、刘庆嵩的传承和发展，黄牧甫之学延至香港的脉络清晰，渊源有自；其中邓尔雅的角色尤其关键，孕育「岭南派」在港展开，从学者甚众，对黄牧甫印艺有传播之功。1950年代以后，以师从刘庆嵩的冯康侯最能发挥影响力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几乎主导了香港印坛，使黄牧甫门下相承不绝，而「友声」的成立，亦获冯康侯支持，无论师冯氏门下，或是深受其影响者，皆各有所成，使岭南一派得以薪火相传，蓬勃发展。

然若细观香港印人风貌，也非独宗黄牧甫一家，他们各有师承，有宗法他派，或自出机杼，尤其进入21世纪信息发达的年代，地域风格随之而淡化，创作方向日趋纷呈，面貌多样，这可说是当代香港篆刻的最大特色之一。纵然如此，香港仍然是岭南篆刻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地域主流风格始终以黄牧甫一脉为依。

为香港印学研究奠基

³⁰ 刘浩敏：〈黄牧甫流派印人〉，载《黄牧甫生平及篆刻艺术之研究》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史哲学博士论文，2012），页121—129。

香港是岭南篆刻的发展重地，尤其自 1950 年代初至 1980 年代末，以黄牧甫为宗的「岭南派」延至香港，其渊源、传承及影响，皆是香港印学研究领域中不容忽视的题目。然而，1990 年代迄今，香港印学尚未蔚为风气，发展重心转移内地，虽有个别印人活跃于本地印坛，也有院校或机构举辨展览、课程，但在发展上失去了连续性，形成断层现象。相对于中、日、台等地，当今印学在香港所受重视程度不高，研究成果匮乏，整体滞后，有待进一步发展。

事实上，香港篆刻的发展条件充足，「香江五老」邓尔雅、冯康侯等早期印人固然春风化雨、名声在外，续有「友声」诸子发扬印学，部分仍活跃于当代印坛，卓然成家。院校方面，除了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浸会大学，还有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设系统课程，培育新进，近有「西泠学堂」(2017)于去年在港首办展览，展出印章、印稿皆为「西泠印社」珍藏，续于今年开设篆刻课程。另有其他本地团体举辨交流活动，如讲座、展览等，重要者如「油尖区文化艺术协会」分别于 2005、2014 年举办的「香港篆刻名家邀请展」，各展集合超过 50 至 70 位不等的印人，并出版作品集，实在难得。³¹

印学研究，以印章、印谱为重要依据，这方面的材料也甚丰富。香港公私所藏印谱现存近 2,000 多种，为国内外之最，其中以香港私人藏家松荫轩的收藏为重要，次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 200 多种，惜乏人问津，反映了研究的迫切性。³² 历代古玺则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收逾千数最伙，藏印初自北山堂捐赠，后历年增益，并透过展览及出版物总结成果，如上述王人聪多种著述可引为例子，并在 2000 年与浙江省博物馆合办「中国历代玺印艺术」展览及「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」促进交流，颇有成果。³³ 另外，香港亦为目前于世界上收藏最多元代景教铜印之地，约 990 多枚，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珍藏，印章初自聂克逊搜集，继由利希慎基金会赠予香港大学，其中 700 多件展出于「元代景教铜牌展」(2015)。至于明清至近现代流派印章，则以香港艺术馆及其分馆茶具文物馆藏藏品为重要，总近 1,000 枚，主要由罗桂祥基金慷慨捐赠，其他捐赠者有简经纶的学生王汉翹(1914-2005)、丁衍庸(1902-1978)后人刘秉衡(1915-2003)的遗孀冯丽鸿等，其中包括广东、香港篆刻近 200 枚、涉印人约 60 位，充分反映岭南印风的丰富多样，尤具价值，深入后可补足香港印史、以至于岭南印学之空白。

³¹ 《香港篆刻名家作品集》，香港：油尖区文化艺术协会，2005；《香港篆刻名家作品集》，香港：油尖区文化艺术协会，2013。

³² 刘浩敏：〈香港公私藏印谱辑要〉，载《岭南印记—刘浩敏印学文集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，2018)，页 16-55。

³³ 王人聪、游学华编：《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2000。

总而言之，香港存有珍贵的印学研究材料，近年来引起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，尤其广东印学在近世印坛愈来愈备受瞩目的趋势下，有来港搜集资料、或借鉴本地印学成果，以弘扬中国文化。反观香港印学，其独特性和发展本来是别具优势，但近年却发展缓慢，学术成果稀少，实应予以重视。后来者当汇整前人的成果，作有系统的史料辑佚，建构本地印学数据文件，并促进篆刻教育和推广，使香港篆刻得以推陈出新。本文藉由勾勒本地近 150 年印坛的轮廓，确立香港于岭南、甚至是中国印学的重要地位，并重申其地域性意义和影响力，冀能为香港印学研究揭示方向。